



抓住機遇強化香港「超級聯繫人」角色

議事論事

第九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在胡劍江

香港成功舉辦，這是在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後，香港舉辦的首場共建「一帶一路」國際盛事。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健全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中央支持香港深化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互惠合作，必將進一步強化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地位，推動香港實現更好的發展。

自2016年起，每年在香港舉辦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匯聚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及相關國家和地區的主要官員及商界翹楚，共同探討「一帶一路」帶來的龐大商機，就促進區域合作交流意見，並探討務實的商业合作機會。本屆高峰論壇主題為「構建互聯互通、創新及綠色新絲

路」，吸引了近6000位來自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士與會，包括超過80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政商領袖。由當年的1000位與會人士到今天的近6000位，人數增加數以倍計；從當年的100多場專案對接會，到如今的800場，多年來累計達到4000場，促成了大量企業合作，並提供了大量專案投資融資和專業支援等服務。從以上數字可反映出，九年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成果豐碩、成就斐然，亦體現了香港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擔當着重要角色，彰顯出香港的非凡魅力、能力和活力。

發揮「超級聚寶盆」作用

香港享有祖國和全球優勢，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作用，提供專業服務貿易支援，同時亦是自由及多邊貿易的堅定支持者。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海內外金融機構和人才聚集，融資

渠道多元，與國際接軌的規則和制度深受國際投資者認可信賴，在資金融通方面一直發揮匯聚國際資本的「超級聚寶盆」作用。

當前環球經濟普遍不穩的形勢下，香港作為我國高度對外開放的城市，憑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仍有着很強的國際吸引力，可以協助國家和企業「走出去」，也適合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請進來」，進一步拓展對外開放格局，扮演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成為「一帶一路」的重要宣傳站。而且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建設節點和首選平台，不但在國際項目投融資，更在離岸人民幣業務、專業服務支援和經貿交流合作等各方面發揮互惠共贏的作用。特別是在金融、航運物流、商貿推廣和跨境投資四個方面，包括協助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收購合併、法律仲裁、地區總部等服務，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支援，這也是高

峰論壇得以持續在香港舉辦的重要原因。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會全力支持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八項行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加強「一帶一路」經貿聯繫，推動交通基建「硬聯通」，重視規則標準「軟聯通」，提升資金融通、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加強青年專業人才交流，深化「一帶一路」合作。

享有中國優勢和全球優勢

近年來，特區政府主動拓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合作，行政長官李家超多次率團出訪東盟和中東國家，僅僅今年就簽署超過50項備忘錄，並獲相關國家再次確定，支持香港盡快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正如李家超在高峰論壇開幕式上所表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邁入下一個金色十年，香港得益於「一國兩制」，享有中國優勢和全球優勢，可以在共建「一帶一路」過

程中發揮關鍵作用。

擔當「一帶一路」「超級聯繫人」角色是香港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把握市場機遇、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香港作為連接中外的門戶，要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作用，協助大灣區企業聯通其他經濟體，繼續匯聚全球人才和智慧，不斷提升自身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服務能力，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發展和全球經濟的繁榮穩定貢獻力量。

筆者相信，社會各界會團結一致，抓住新的機會，不斷開創發展的新局面。

正如夏寶龍主任所指出：「今日之香港，正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張開雙臂歡迎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和朋友們。」有偉大祖國做堅強後盾，有全體港人的努力打拼，香港由治及興未來可期、前景廣闊。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監事委員會副主席

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大有可為

議論風生

陳頌恩

中國於2013年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希望與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國家加強經貿、基礎建設及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促進彼此發展。根據商務部最新的數據，2024年1至7月，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275.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0%。對外承包工程方面，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新簽承包工程合同額7828.2億元人民幣，增長24.8%；完成營業額4968億元人民幣，增長7.4%。

為沿線國家提供專業支持

香港在共建「一帶一路」中可扮演什麼角色呢？首先，香港是中國最大的離岸金融中心，其對國家經濟發展最核心的金融功能可以歸結為兩條：一是幫助業務及資產位於內地的企業或平台，籌集境外投資機構的外來資金；二是幫助境外投資機構投資於內地的企業或平台。

未來，香港可成為內地企業拓展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重要平台，提供包括金融服務和管理諮詢在內的專業支持。香港的金融機構不僅可為內地與「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投資及貿易安排融資、外匯結算及風險對沖，亦可提供會計、法律、風險評估及顧問等專業服務。

其次，香港亦可以為「一帶一路」國家的優質企業提供融資需求，比如符合條件的沿線國家企業可到香港來進行股權以及債券融資。

第三，香港企業要抓住共建「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通過在沿線國家建立生產基地、進行投資、培養人才和參與基礎設施管理來擴大國際影響力。鑒於香港的外貿總額是其本地生產總值的四倍，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往來，有望為香港經濟帶來新的增長動力。

隨着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實施，預計參與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資將大幅增長。香港企業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能夠為這些國家提供專業的管理和運營服務，尤其是在機場、鐵路和港口等關鍵基礎設施的運作上。香港國際機場在全球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這不僅因為香港在機場管理方面的卓越能力，亦因為香港的運營經驗對於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管理水平具有重要價值。

拓展服務貿易新領域

此外，香港的電力行業也已經在東南亞市場佔據了一席之地，其在電力供應和相關技術方面的專業知識，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能源項目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持和諮詢服務。

隨着中國與美西方在地緣政治上的摩擦加劇，共建「一帶一路」這一國家戰略可幫助中國建立更多新的朋友圈。對於香港而言，深入理解這一戰略對於企業及廣大市民至關重要，它將有助於香港利用自身優勢，為經濟增長提供新引擎。面對當前全球經濟增速的減緩，香港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體系正尋找新的增長點，共建「一帶一路」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機遇，鼓勵香港企業向外拓展，開發服務貿易的新領域。通過充分利用香港的獨特優勢，適應全球經貿格局的演變，有望為香港經濟書寫新的成功故事。

農銀國際研究部主管

美國遏港法案的趨勢和意圖

焦點熱評

黃復觀

美國眾議院日前通過所謂的《香港經貿辦證法》，對香港作出抹黑和攻擊，並威脅「關閉」香港特區政府駐美經貿辦。美國當局這一立法手段，顯然是其自2019年以來形成的「以港遏華」策略的新延續。但觀察過去五年，美國當局的遏港手段呈現：「修改法案—實施制裁—新立法案」的變化，目標也呈現出從打壓香港的政治地位、打擊特區政府管治、遏制香港經濟發展，再到打擊個體機構或個人的路徑變化。儘管如此，在中央政府的強力支持下，美國當局無法真正實現其戰略意圖，而顧及在港的巨大經濟貿易利益，以及中央政府的反制，美國當局的手段更多的是政治意義大於實質。

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

美國所採取一切制裁打擊別國的手段，本質上都是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的。因此，美國當局於2017年通過《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責任法案》，從法制的層面完成了相關授權。如果從其國內法的角度觀察，美國當局主要透過如下三種層面對香港採取遏制措施：

第一，國會專門立法。2019年，美國國會以中央政府將在香港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損害了香港自治、侵犯了香港的人權和民主為由，提出要制定新的涉港政策法案，理由是《美國—香港政策法》沒有規定制裁措施所以對香港「保護力度」不夠。因此，2019年11月27日美國國會制定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總體上看，上述兩項立法以及《香港自治法案》，目的都是要把香港的人權、民主、繁榮穩定納入美國國家利益範疇並以此來干預香港事務，同時賦予美國總統改變對港政策的權力。而此次的《香港經貿辦證法》，則是進一步細化相關打擊目標。

第二，總統行政命令。2020年7月，特朗普簽署「關於香港正常化的總統行政令」，也即13936號令，其內容主要

分為兩個部分：其一，勒令商務部、移民局、海關等權力部門終止或暫停基於《美國—香港政策法》賦予香港的貿易優惠、關稅減讓、出入境等方面的特惠政策；其二，對實施香港國安法過程中的有關組織機構、法人實體以及包括政府官員在內的自然人實施制裁。特朗普下台後的拜登政府，分別於2021和2023年簽署兩份備忘錄，決定將有關在美香港人強制離境時間分別後延18和24個月。事實上，美國制裁別國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行政命令，超過60%皆以此為授權，未來也可能以此對香港採取新的打擊手段。

第三，部門專屬規章。這主要是指「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或商務部的規章，其主要內容是總統可以授權政府部門首腦，或在參議院同意的條件下任命專任官員全權代行總統的有關權力。2021年，OFAC公布了所謂的《香港相關制裁條例》，細化13936號行政命令的指令，對香港採取多方的制裁和打擊。根據官方數據，截至2023年底，有174個香港主體遭受了美國的金融制裁，其中法人實體158家，自然人16名。

觀察美國當局的上述手段以及過去五年來的實際情況，可以發現當中的顯著趨勢：

一是從改變政治地位，到打擊特區政府。《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最大的目的和作用在於，將香港形容為一個「失去民主自由的地市」，打擊香港的地位和形象。二是將對港政策與香港的「自治」程度相聯繫。規定總統在給予香港優惠政策前必須審查香港是否享有足夠的自治，否則不能擁有區別於中國內地的特殊待遇。三是授權制裁。對損害香港基本自由和自治的人實施凍結資產、禁止入境等制裁措施，並要求總統提交相應的制裁報告。四是規定了涉港的年度報告評估制度。要求美國務院提交發生在香港的違反美國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行為的性質和程度的評估報告。而其後展開的一系列對特區政府官員及警方

的制裁手段，也是源自於此，都是要打擊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

二是從遏制香港發展，到打擊具體機構。美國近年採取了許多遏港手段，主要集中在經濟範圍，包括取消香港貿易優惠待遇、禁止財產交易、凍結被制裁主體財產等手段，其目的都是要打擊香港的發展。而日前通過的《香港經貿辦證法》是首次出現的「單一性針對」的法案。根據內容，美國國務卿須在法案生效後的30日或之內，向國會認證香港經貿辦應否繼續享有儼如外交機構享有的特別待遇，若國務卿對此持否定態度，經貿辦須在認證後180日內停止運作。法案又訂明，美國政府在與經貿辦合作或協議中，不能把特區政府描述為保護法治或人權，又或者容許特區政府為「破壞香港自治及自由」辯護。可以說，法案更加細化，更加具體。

在港擁巨大利益難為所欲為

其實，由上可見，美國當局對香港採取的遏制打擊手段是有所顧慮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在香港擁有大量的實質性經濟利益，過去十年，美對港貿易順差超過2700億美元，在其全球貿易夥伴中最高，目前1200餘家美企業在港投資興業。也就是說，美國不能採取像針對其他地區類似的手段針對香港，否則美國商界將因此蒙受巨大損失。同時，美國當局也深知，中央政府不會坐視其行徑，必然會採取對等的反制措施，這是其所無法承受的。因此，儘管美國當局看似來勢洶洶，但對香港及美國自身的影響是極其有限的，用另一種表述方式，這是政治表態高於實質。

1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上答問時說，該法案將正常的經貿合作政治化、工具化，蓄意抹黑香港駐外機構，性質十分惡劣。「如美方一意孤行，繼續推進涉港惡法，膽敢關閉香港駐美經貿辦，必將遭到中方堅決反制。」美國當局對此警告的作用，心知肚明。

美國打不垮更孤立不了中國



知微篇 周八駿

1954年，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和緬甸，分別同印緬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當時的背景是，二次大戰結束不久，東西方格局基本形成，但是，若干國家之間矛盾依然存在；朝鮮戰爭取得停火，但是，以戰爭方式對待國與國之間分歧的威脅依然存在。戰爭的代價是昂貴的，甚至是十分慘痛的。中國領導人高瞻遠矚，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家之間關係的準則，獲得國際社會廣泛支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排序，清楚展示

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是基本條件；平等互利是積極合作、謀求共贏；具備了前四項，才談得上和平共處。換言之，衡量國與國之間關係是否「和平共處」，必須滿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

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之間的「冷戰」，不是「和平共處」。否則，就毋須定義為「冷戰」。「冷戰」的性質是「戰」，即殊死較量，之所以不訴諸熱戰，首先是因為，二次大戰以空前慘痛的代價形成了兩個陣營各自勢力範圍，雙方皆不願意再大動干戈來改變既定格局；嗣後，由於美蘇皆擁有核武庫，形成「確保相互摧毀」的核平衡。

「冷戰」不是「和平共處」，否則，

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就毋須系統提出「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和平過渡」，主動爭取東西方緩和。

那麼，「冷戰」是什麼呢？筆者認為是「和平共存」。漢語的「共處」與「共存」是有區別的。前者的「處」，是相互發生關係的意思。後者的「存」，是相互可以「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美蘇當年「冷戰」，不僅不相往來，而且，相互高度戒備。

2024年8月2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中方的新聞稿中有一段是關於沙利文所言——「我願重申，美方不尋求打『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體系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美方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無意將台灣作為遏制中國的工具。美方希望同中方繼

續保持戰略性溝通，找到美中兩國和平共存、美中關係持續發展的辦法。」

白宮的新聞稿沒有中方上述報道。當然，美方不否認沙利文說過那些話。雙方報道上的這一差異，反映在美方看來，沙利文說過的這些話不重要。

確實，從拜登到布林肯和沙利文，關於美方不尋求打「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體系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美方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無意將台灣作為遏制中國的工具，美方希望同中方繼續保持戰略性溝通諸如此類的話，皆口是心非。比較有新意的是，沙利文這一回在北京說了美方希望「找到美中兩國和平共存、美中關係持續發展的辦法」。

其實，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再強調的中國處理中美關係的原則「互相尊重、和平

共處、合作共贏」，就是中美兩國和平共處、兩國關係持續發展之道。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完全可以引領中美關係持續發展。問題的癥結在於，美方視中國為其維持全球霸權的最主要對手，必欲打垮中國，破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此，中方的簡報把英語的「coexist in peace」譯成漢語的「和平共存」而不是「和平共處」，是準確地把握了沙利文陳述的美方觀點。

美國自2018年上半年至今對中國逾6年打壓圍堵遏制，使其明白，中國太大，不可能被打垮，中國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聯繫太密切，不可能被孤立，這才產生與中國「和平共存」的念想。拜登政府反覆念叨美國不欲同中國打「新冷戰」，但是，聲稱欲同中國「和平共存」而拒絕「互相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便暴露其中已處「新冷戰」。

資深評論員、博士